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第二辑

郭冰茹 著

寻找一种叙述方式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郭冰茹 著

寻找一种叙述方式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一种叙述方式 / 郭冰茹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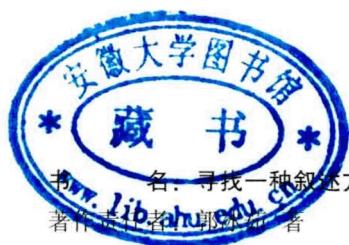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4421-0

I. ①寻… II. ①郭… III. ①叙述—小说研究—中国—20 世纪—文集

IV. ① I207.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6221 号



书 名: 寻找一种叙述方式

著 者: 郭冰茹 著

责 任 编 辑: 黄敏劼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4421-0/I·2792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电 子 信 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8.5 印张 24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作者简介

郭冰茹，1974年生，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曾获《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200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类三等奖（2013）。著有《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革命与情爱——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译著）等。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丛书主编 吴义勤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招聘了

两期共 19 名青年评论家作为客座研究员。第三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工作也即将完成。

两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70 后”“80 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70 后”“80 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鉴于客座研究员工作的美好成效和巨大社会反响，李冰书记在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到期离馆时曾专门作出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进一步扩大规模”的批示。

为了充分展示客座研究员这一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为每一个客座研究员推出一本代表其风格与水平的评论集，我们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丛书第一辑 8 本在 2013 年 6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现在第二辑 12 本也即将付梓出版，我们对之同样充满期待。

是为序。

吴义勤

2014 年春于文学馆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3

第一辑

“传统叙事资源”的压抑、激活与再造 2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叙事传统” 15

莫言长篇小说的古典形式 29

苏童小说与话本传统 39

“革命叙事”的转换、扬弃与消解

——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围墙》《单位》为中心 55

十七年（1949—1966）小说的叙事张力 68

革命叙事中的爱情

——重读《三家巷》 83

第二辑

女性解放话语建构中的悖论

——关于现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 96

女性主义批评中国化之反思 109

性别、历史建构与中国经验

——对中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考察 122

个人、身体与“个人化写作” 137

性别的消隐与呈现

——关于 50 年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 148

萧红小说与“民族国家”话语 164

丁玲早期小说论 178

“新家庭”想象与女性的性别认同

——关于现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 192

第三辑

方法与政治

——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 208

“潜在写作”的命名与当代文学史研究空间的拓展 220

丁玲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和转型 231

陈翔鹤小说论 248

日常的风景

——论王安忆的“文革”叙述 261

论祝勇的“新散文”创作 271

程文超的文学批评 281

走笔至此（代后记） 290

第一辑

在当代小说的叙事研究中，重建其与“传统叙事资源”的对话关系是一大难题。现代以来，中国小说深受“西方”影响，但“传统叙事资源”仍若隐若现地渗透在现代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之中，只是这样的进程常常被忽视和看轻。80年代的“小说革命”将这一问题提出，却转瞬即逝。在当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和文化身份危机出现后，确认“传统叙事资源”的当代性意义，激活与再造被压抑的“传统叙事资源”，成为解决危机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对小说究竟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决定了小说能否发生新的“革命”。

“传统叙事资源”的压抑、激活与再造

中国现代小说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小说观念和文体是比较“西方”化的，但“传统叙事资源”的各种因素也若隐若现地在现代小说的演进过程中被改造和激活，这一状况持续到当代。建国初“十七年”曾强调小说在文体、风格上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80年代小说写作逐渐繁荣并呈现出不同的路径，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回应，“寻根文学”突出了小说家以择取“传统叙事资源”回应西方现代性的方式；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曾分属“寻根”“先锋”的作家如莫言、韩少功、格非等都有明确回归“传统叙事资源”的意识与实践，主张不写欧化的小说，他们的文本在小说精神和叙事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当代小说与“传统叙事资源”的关系成为典型的“中国问题”。在文学的文化身份日趋重要，小说艺术需要新的创作资源的当下，重建小说与“传统叙事资源”的对话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

讨论当代小说与“传统叙事资源”的对话关系，是在“汉语写作”的框架之中，又相对于“西方”而言。“传统叙事资源”有时被表述为“本土叙事资源”“中国叙事传统”等，这几种表达在时间上通常是指中国古代，在空间上则相对于“西方”或“世界”。如果从类型上说，

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无疑是现代小说的主要叙事资源；除此之外，尽管将史传一类的历史文献、汉赋和叙事散文等视为古典小说的源头在学界存有争议，但现代小说受这一类传统叙事资源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同时，口耳相传的民歌、民间传说等民间叙事资源的发达及其对小说和整个文学创作的影响在现代以来也颇受重视。因而，这里所说的“中国叙事资源”大致上包括古典小说、史传传统和民间叙事资源等。

中国近现代小说受“西方”影响巨大，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传统叙事资源”也渗透在现代小说的发生、发展之中。这种“外部”和“内部”的影响，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小说史的种种论著中都得到彰显。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在援引叙事学理论讨论晚清小说的文体变化时，强调传统文学中的各种成分，通过移位与杂交改造了中国小说。学者型小说家格非谈论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时认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近现代以来的小说对古典小说不同文类的重新书写和择取从未中断。”^①他列举的个案包括：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汉赋、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的小品，张恨水和张爱玲之于章回体小说。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比如阿城之于笔记小说，何立伟之于唐人绝句等。

其实，进入当代以后的小说创作对于“传统叙事资源”的重新书写和择取也从未中断，不仅仅是汪曾祺、阿城这样的个案。作为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传统叙事资源”的影响始终存在，这使我们重新梳理当代小说与“传统叙事资源”的关系成为可能。在建国初“十七年”，最典型的例证是包括《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在内的“革命英雄传奇”多采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这些文本在讲述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也体现出古代英

^① 格非：《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雄传奇和历史演义的叙事特征，而作家对民间叙事传统的挖掘与整理以及评论家坚持的意识形态方向对传统叙事资源的修正，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想象与传统叙事资源之间的丰富张力。在即便是我们认为与传统实现了最彻底决裂的“文革”时期，“传统叙事资源”的影响也依然存在，比如小说叙事中的主流话语对叙事传统的“革命”；“手抄本”中的通俗性和大众话语的参与；文人写作的叙事传统背景等，在小说的文化传统遭遇“断裂”的情形下，“传统叙事资源”仍然有某种延续。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阶段的文学创作是在与“西方”隔绝的前提下进行的。

80年代以后，“西方”再次成为“现代”的代名词，成为需要实现思想解放的中国学习的一个范式。中国思想界，包括文学界都是在对“西方”的想象中理解现代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1985年前后的“小说革命”正是“现代性焦虑”的一种结果。在讨论80年代的“小说革命”时，我们通常会将“先锋小说”视为对西方现代性的回应，实际上，“寻根文学”也是这一回应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的差异，并非学习或是回避西方现代性，而是前者侧重“西方”，而后者立足“本土”。就小说技术而言，“寻根”并不拒绝现代派技巧，即使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爸爸爸》也未尝不可视为“先锋小说”。与“先锋小说”相比，在对待传统资源方面，“寻根文学”的态度正面而积极，但这并没有导致复古主义或者对现代主义的排斥。蔡翔在《〈上海文学〉与“杭州会议”》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饶有意味的是，‘杭州会议’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却未引出任何狭隘观念或者复古主义，没有任何这方面思想的蛛丝马迹。相反在这次会议上，现代主义乃至西方的现代思想和现代学术仍是主要的话题之一。”^①他认为，“寻根文学”仍然是在

^① 蔡翔：《〈上海文学〉与“杭州会议”》，收入《生机——新时期著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现代性的召唤之下的写作。韩少功著名的文论《文学的“根”》几乎被视为“寻根文学”的“宣言”。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韩少功不仅讲到了对待“西方”的态度，而且侧重提到了乡土中所凝固的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重要。他谈到回到传统与西方的关系时说：“这丝毫不象征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接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但有一点似应指出，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本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或获奖作品，即已入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拟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远景黯淡。”^①今天回头来看 80 年代以来以西方小说为主要参照的一些探索作品，确实存在韩少功所说的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这样的毛病。

尽管韩少功未用“民间资源”这样的概念，但整篇文章对“民间资源”的重视可以说是其主旨：“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泥土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乡土中所凝固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气，性爱方法，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进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時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地吸收，来获得养分，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

^① 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 年 4 月号。

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①所以说，对“传统叙事资源”的重视，包含了对乡土、民间资源的强调。

究竟如何来讨论“寻根文学”的文化意义，即便在今天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无论是韩少功等倡导者的主张，还是具体被归入“寻根小说”的文本，如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阿城的《棋王》、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等，都可以看出其对“文化传统”和“东方审美优势”的重视，这是80年代小说创作的一种路向。

对“传统叙事资源”的重视，还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上，这种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小说的内容和审美特征。无论是“寻根文学”作家还是“先锋小说”作家，都先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年的先锋小说家格非，是这些年来特别重视“传统叙事资源”的作家之一，他认为中国小说的超越是经由世俗完成的，也就是说不离世俗而超越世俗：“我认为，中国的章回体小说特别强调的‘世情’、‘世事’和‘人情’，既是描述的对象，也是超越的对象。”^②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红楼梦》《金瓶梅》《水浒》等便是经由世俗完成超越的。我们通常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在西方的影响下放弃了世俗和趣味，变成了启蒙和理性。这种认识大致不错，但在小说的内部，其实也有着不同的文化构成。世俗、趣味和意义、理性也非完全脱离，即使以写世俗生活为主的现代通俗文学也起到改造人心的作用，张恨水的小说便是如此。而当代小说，包括“革命叙事”小说中的革命性也未完全压抑住世俗性。

对小说与“世俗”关系的理解，更早也更详细的论述是在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一书中。阿城认为“世俗经验最容

① 韩少功：《文学的“根”》。

② 格非：《中国小说的两个传统》。

易转为文人视角。”“以平常心论,我想中国文化基本是世俗文化吧。”^①因此,他把小说转入世俗化视为小说生态恢复正常:“近几年来,中国小说样貌基本转入世俗化,不少人为之痛心疾首,感觉不出这正是小说生态可能恢复正常的开始。”^②阿城回溯了明清以来小说的世俗性问题:“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读的大部头古典小说,多是明代产生的,《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封神演义》、‘三言’‘二拍’拟话本等等,无一不是描写世俗的小说,而且明明白白是要世俗之人来读的。”“《金瓶梅词话》应该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如果不是满人入关后的清教意识与文字制度,由晚明小说直接一路发展下来,本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大概会是另外的提法。”阿城甚至认为“单从白话的角度来说,新文学不如同时代的世俗文学,直到张爱玲才起死回生。”在世俗性被忽视后的许多年,“80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受戒》之后是贾平凹由《商州初录》开始的‘商州系列’散文”^③。冯骥才和邓友梅的小说同样也呈现了世俗性之于小说的魅力。在199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贾平凹的《废都》承接的也正是《金瓶梅》的传统,但因为这部小说的性描写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它与“传统叙事资源”的关系这一重要话题反倒被视而不见了。

二

对80年代小说与“传统叙事资源”关系的简单梳理并不是要缩小“西方”对新时期“小说革命”的重要影响,而是试图揭示这种影响几

① 阿城:《闲话闲说》,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184页。

③ 同上书,第102、135、158页。

乎遮蔽了当代小说回溯“传统叙事资源”的进程。显然，在对“8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传统叙事资源”的意义被压抑了。

阿来于2000年发表的《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是作家中较早谈论当代小说与民间资源（不是民间立场）关系的文章。阿来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对于许多批评家从西方和汉语言文学传统中追溯傻子少爷这个形象的缘起，他承认其合理性，他说：“是的，不管我们属于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哪一个民族，只要你用汉语进行创作，你就必须尊崇汉语言的深厚绵远的传统，自然而然地就要从这个传统中寻求启示和滋养。”所以，阿来“乐于承认自己通过汉语受到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也非常乐于承认自己受到的世界文学的影响。”但是，《尘埃落定》描述藏族嘉绒部族的历史，与藏族民间的集体记忆与表述方式之间有着必然的渊源，阿来指出了批评界对民族民间文化的忽视：“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况是，一方面西藏的自然界和藏族文化被视为世界性的话题，但在具体的研究中，真正的民族民间文化却很难进入批评界的视野。所以，阿古顿巴这个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与《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之间，那种若有若无的联系之不被人注意，好像就成了一个命定的事情。”^①而除了人物之外，阿来认为《尘埃落定》文体创造中所受到的民间文化的影响同样也被批评界忽略了。

阿来所说的“令人遗憾”的情况，正是格非谈到的近现代以来中国小说写作的一个“怪圈”：“自中国国门打开以后，中国小说一直在寻求与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学交流与沟通，但是这样的交流和沟通却是伴随着对自身的强烈质疑、批判或者抛弃冲动而展开的。这就使中国小说的写作陷入到一个巨大矛盾怪圈中，事实上也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作家深刻的现代性焦虑：由于小说叙事的遗产和‘进步’世界文学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由于激进思潮的普遍蔓延，对一种文学新秩序的渴

^① 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载《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